

我的祖父在中国

1903-1930：

瑞典事工历史片段

米克·里德贝克 著

序

我最早的记忆是跟父亲一起坐在高高的橱柜前面的地板上，他给我看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金发男孩，穿着海军服，旁边则是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先生。父亲说男孩就是他自己，而那位先生则是我的祖父。照片的下方写着的一句话：“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了”。我知道那是父亲写的，而他当时只有五岁。我还记得相册里其他一些很难懂的照片，其中一张是这样的：照片上有一大一小两口棺材，上面放了一些云杉树枝，小胡子先生和男孩就站在旁边，穿着厚重的冬装，地上满是积雪。每次看着照片，我都感觉很怪异。另外还有一些有趣的照片……有的上面小男孩骑着驴，还有稍大些的时候站在积木城堡旁边的照片。有时候照片上还有中国人，我知道他们都生活在中国，是传教士。我还听说成为一个传教士是件很好的事情。这种感觉会伴随我一辈子。

不仅仅是祖父母，我的很多其他亲人也都是或者曾经做过传教士。他们回瑞典“休假”的时候就会来看我们。我的第一堂语言课就来自于他们带来的书上——斯瓦西里语。我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也来自于到过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士之家，通过她，我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位老传教士，他曾经是祖父的同事。我和家人曾经去坦桑尼亚做过几年的传教士。我在教会与传教士们一起工作了十几年，招募和培训候选人，在他们工作期间以及回来后也与他们见面。事工是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

2001年，我和丈夫有幸跟在香港工作的朋友一起去了中国。我们去了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这是我祖父母所在的差会工作的教区。出发之前，我读过祖母给她远在蒙斯特拉斯市的“亲爱的父母，兄弟姐妹”所写的一些信件，信中描述了他们在教区几年的生活，让我很受感动。特别留意写信的地点，我发现当时家人是住在运城和蒲州，这是我不太了解的地方。

我们还带了很多照片。

我曾经读过祖父写给他在瑞典的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的一些信件，那些信写于他们分离的那段时间，1923 年到 1930 年之间，也就是我父亲 5 岁到 13 岁之间。以前我只是听说过那些信件，但一直没有见到过。直到来中国的前一年，父母故去不久，我们整理他们房子的时候才发现。

祖父去世后葬在了海州，跟他的两任妻子以及五个孩子葬在了一起。他唯一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的孩子便是我的父亲。在中国的一个星期，我们遇到了被祖父母的故事感动的中国基督教徒，他们告诉我：“你一定要把你祖父的故事写下来，我们需要它作为另一方面的对照，来反驳那些把早期传教士当作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宣传。他们是最好的榜样，只做好事，不求回报，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本来只是期望这次旅途只对我个人有意义，让我尽可能了解父亲的成长背景，却没想到这个故事对中国的人们也有意义。我试图描画出在中国的祖父祖母。当然了，这同时也是上个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差会的写照，并成为了中国教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

瑞典到中国的事工——瑞华会 (SMK) —— 一个新的差会

“1887 年，跟着主的感召，年轻人符愷励来到了中国，想让耶稣这个名字传遍这片大地。”¹ 当时还没有任何瑞典差会打算在那里开展工作，因此符愷励只身前去。英国的一位朋友给了他生活费以及旅费。出发前不久，符愷励联系到了另外一个很想来中国的年轻人，约瑟夫·霍尔姆格林。他承诺会为符愷励祈祷，并且成为符愷励和其他那些将来会愿意来中国的人们之间的桥梁。不久之后出现了瑞典传教委员会——瑞典中国差会，它的任务主要是向符愷励提供资金，派遣工作伙伴。1887 年 3 月 14 日，符愷励到达了上海，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有人帮他进入了中国内地会在安庆的语言学校，六个月后，这些学生们便做好到他们的教区去的准备了。

根据别人的建议，符愷励在山西西南部开始工作，一个“福音还未到达的地方”。他发现一直有秘密警察监视着他。开始的时候，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到当地人的信任，因为这些人从未见过外国人。最后他终于在运城安顿下来并且开了一家鸦片收容所。但有一件事却反映了公众的情绪：为他打开城镇大门的那个人遭到了重罚。第一次洗礼发生在 1889 年。符愷励随即被要求在邻近的两个省展开工作，陕西和河南。“.....在神预备他的道的同时，我们发展了新的领域。”陆续有同工从瑞典来到中国，第一年两个，第二年五个，到后来越来越多。随着每年 3 月 14 日的祈祷和感恩日的进行，在瑞典的工作也有所发展，一间小办公室，以及事工期刊《秦地》(Sinims Land) 出现了。到了 1900 年，瑞典中国差会在教区拥有三十个传教士，在瑞典有 74 个代表，年收入 44500 克朗。

¹ 《中国事工》 1917 年 1 月 1 日

祖父的故事

我在信件中，事工期刊《秦地》中，相册以及相关日记当中搜寻了所有提及到祖父的地方，以下这些就是我的发现。

背景及初到

1876 年 10 月 20 号，衛潤世 (Verner Wester) 出生于瑞典库姆拉市的教区，父亲是佃农拉尔斯·古斯塔夫·韦斯特，母亲是约翰娜·索非亚。19 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家到一家鞋店帮工，第二年他更加坚定了耶稣为主的信念，跟其他志同道合者开始了青年工作。早在作为坚信礼提名人的时候，衛潤世就想到了传教，现在这种想法又回来了。同样来自于库姆拉市的瑞典中国差会传教士阿克斯尔·哈恩曾经问他是否想过成为一名传教士，他回答，早就感受到了主的感召。1899 年到 1900 年间，衛潤世参加了在卡维斯塔的厄勒布鲁郡学院的成人教育。在他成为传教士候选人之后，他在斯德哥尔摩南方学院接受了宗教教育。²

1903 年 2 月 24 号，跟另一名初到者同行，26 岁的衛潤世来到了上海。他们在中国内地会之家住了一个月。在符愷励的陪伴下，他们踏上了通往教区的道路。³ 他们花了六天时间坐船来到了离北京很近的天津，这段时间，他第一次跟中国人“以他们的方式”一起住，一起吃。他们又往内地走了三个星期。每件事情都新鲜有趣，这里的人，这里的语言，还有环境。看着被早些年的战争所毁掉的村庄，衛潤世心里很沉重。五月份他们到达了教区，衛潤世也来到了他在运城的第一个家——差会的中心站，那个时候共有五个传教士生活工作在这里。跟其他人一样，衛潤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语言。他的老师是位很斯文的老先生，但从未

² 《秦地》1902 年

³ 《秦地》1903 年，来自衛潤世的信 6/3

想过与外国人打交道，那个时候作为基督教徒的岳母的去世影响了他。⁴ 一年半之后，衛潤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汉语进步太慢，“但是当你开始理解的时候，是那么的开心！”

天热的时候，衛潤世第一次搬到了山里的避暑山洞里，胡林德一家住在一起。林德的妻子和两岁的儿子都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两个病人非常痛苦，而且相互影响颇大，所以孩子就被转移到了山洞旁边的房子里，衛潤世负责照顾这个孩子，并一直坚持到最后。在痛苦的最后时刻，林德太太看到了“她即将走向的幸福”。那之后不久，林德传教士和衛潤世来到了北庄圣会。在拥挤的教堂中，他们一起参加了晨祷，所有人一起朗诵他们背下来的经文。有一个男孩竟然知道整个的约翰福音。在这之后则是布道、任命长老和执事的教堂会议、对于九名施洗候选人的任命，最后则是美妙的唱诗集会。当他们很晚回到家的时候，衛潤世心里确定了，这就是他所想去的教区，他祈祷能够尽快参加到这些人的工作中。⁵

1903 年的教区

以下的信息⁶发布于衛潤世在中国工作的第一年的年底，也就是瑞典中国差会工作的第十七年。山西省的工作主要在运城、猗氏、海州，以及蒲州府等地开展。陕西省的传教士生活在通州府（大荔）和韩城。河南的工作遇到了阻力和迫害，但工作也得以在新安、洛宁进行下去，最后在河南府（现在的洛阳）也开展了工作。传教士们居住地附近的村子里，工作也得到了很好的开展。到目前为止传教主要还是开拓性工作，但小教会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地方行政官员以及人们的态度也有所改善。教区共有 34 名传教士，两名当地的同工，比如福音传道者，还有 20 名教圣经的妇女。教堂里有 234 名成员，其中 80 位都已经在当年受洗，而且学校里还有 61 名学员。当年信徒们一共捐助了 200 两银子（当时相当于 500 克朗），这

⁴ 《秦地》1904 年 1 月

⁵ 《秦地》1903 年，来自衛潤世的信 2/8

⁶ 《秦地》1903 年

是教会自养原则取得进步的标志。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在每个地区建立男子学校，在每个省建立更大的女子学校，以及为当地的同工们建起神学院。

家里的工作

在瑞典开展的“家里的工作”是在中国开展事工的先决条件。在事工期刊上可以看到如下这些报道：关于事工小组、祈祷小组、秋季会议、大会、旅行事工、休假中传教士的会议、讲座、教区奉献箱，以及事工市集等。因着同样的追求，事工之友和传教士相互帮助——没有事工之友，就没有传教士。一个传教士每年的花费是 1200 克朗，无论男或女；没有孩子的家庭是 2400 克朗，福音传道者 200 克朗，教圣经的妇女 100 克朗。⁷

差会弟兄姐妹们真诚而又深厚的友谊是用爱的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他们冒险进入了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只能依靠彼此。相互的依靠，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感召将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事工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时代。不过那个时代不时出现的矛盾与不调和，却从未出现在那些信中。

中国人始终是中国人

传教士教导，信徒们要从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能支持教堂。一旦堂区的实力增强，传教士们相信他们的角色就是领导和在老信徒旁边指导了。传道工作以及牧养教会便会成为中国人的责任。“即使改变信仰，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西方模式的新教会，而是作为睿智的建设者，奠定基础，让圣灵建立圣会，也就是他所一直期待的身体。”⁸

1906 年，事工期刊登出了海州一个小教堂的照片，⁹ 它要求读者注意教堂的前面，那里悬挂了陕西西安附近的内斯托利纪念碑的照片。那是中世纪时期，甚或更早，基督教即在

⁷ 《秦地》1905 年

⁸ 《秦地》1904 年

⁹ 《秦地》1906 年 1 月 6 日

中国传播的证明。1625 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碑文提到了发生于公元 630 年的事件。这是个三米高的花岗岩石板，顶部带有十字架，下面用中文和叙利亚文介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这证明了传教士并不是在向中国传播一种新的外来的宗教。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落脚的时候，罗马修道士才首次到了英格兰。

衛潤世搬到了海州，从那里他记录了他们如何利用中国春节前后的假期。¹⁰ 利用一个手风琴，一个铜锣，他们在很多地方集合了大批的听众。有些人带了凳子来听，有人给他们带来水果或茶水，一些人还买了他们的书。教会的信徒们每个下午在不同的家里聚在一起热情的祈祷，来庆祝“传道同盟祈祷周”。他们在不同的布道所为男信徒和女信徒开办了为期两周的圣经课程。信徒们在市集、在戏院、在村庄城镇里传播福音。男人们把竹竿带回家，女人们做成帐篷，用于不同地方的事工聚会。他们常常在同一个市集上支上整整一个月的帐篷，而且牧师和传教士们一天布道几次。即使帐篷撤掉之后很久，张贴的海报也在继续向路人传递着他们的信息。他们分发宣传册，售卖各类书籍及圣经。有时候听众达上千人。很多时候人们向他们投来怀疑甚至敌视的目光。或许人们只是跑来看老外。但是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市集是他们初次听说耶稣的地方。

户外的布道常常是由周围的事件启发而来的一些谈话，话题可以是得救、报应、或者神性，当然不能漏掉来自于生活中的那些恶习，比如说邪神崇拜，抽大烟，或者赌博。谚语或者名著中的引言引起了人们进一步的思考。由于大多数听众不识字，而且从未听过方言之外的语言，传道的语言一定要简单。“如果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他们便不会相信，甚或产生反感。”旅行布道也会利用单独的谈话，让传教者们有更多的机会回答问题或者回复质疑，也让人们更易理解，产生兴趣。

¹⁰ 《秦地》1905 年，来自衛潤世的信 9/2

事工与文化

传教士们一直都在担心能否适应中国的文化。社会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要求女性的工作必须由女性来开展。大部分的传教工作都是在布道所的会客室里或者鸦片收容所进行的。传教工作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女传教士，针对女性有专门的收容所、专门的会客室，而且在教堂里还有专门的妇女区域。女同工的住处离男同工要有一定的距离。开展工作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到外面布道或者售书的时候，女传教士一定要与男传教士采取不同的方式。会见妇女，一定要到她们的家里去。当女传教士或教圣经的妇女在门口碰到一些中国妇女的时候，她一定要先聊上一段时间，然后再谈到信仰，以及她到来的原因。老年妇女买书可能是给子女或孙子女看的。如果传教士想把宣传册卖给这些妇女，她就要做好教她们读书识字的准备了。家访或者阅读小组也是妇女传教活动的一部分。传教士经常带一本字体很大、内容简单的书到她们家里。在一些礼貌的寒暄之后，女传教士可能会唱一首歌，写下并解释一些汉字，告诉她们读音和意思，几次之后，她们就慢慢有了兴趣并愿意买书、学着去读。在妇女会客室里，女传教士常常要每个星期拿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来教妇女们识字，这也是施加个人影响的好机会。

传教士们对于中国女性的苦难生活很是忧虑。小的时候，因为是个女孩，父亲在给孩子排行的时候就把她排除在外。从七岁开始，她就被禁止坐在男孩或者男性的旁边，或与他们同吃。她没有机会去上学，很小的时候就被许给了另外一家人家。如果她家有了困难，她就要很早嫁到公婆家，家人既得到了钱，还少了一张嘴吃饭，而她则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利的奴仆一般。家族很大，可能有一个婆婆，还有好几个年长于她的妇女。如果她二十岁之前还嫁不出去，就会被认为是老姑娘了。为了不给家族带来厄运，她们必须遵从很多的风俗礼仪。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她不敢洗衣；在一些月份的某几天里，她甚至什么活都不能做。有些日子里，她不能摸菜刀；有些日子里，不能碰到井边的把手。如果家人运气不好，很可能

就是她破坏规矩，惹怒了上天。如果家里遭受饥荒，妻子和女儿都有可能被卖掉。中国现在是禁止一夫多妻的，但那个时候男人却可以有数不清的小妾。她们没有任何的法律权利，丈夫可以随意把他们休掉。最让人不可忍受的便是女孩裹脚。为了一种歪曲的时尚，裹得一次比一次紧。成年女人的脚应该小到能在男人的手心里跳舞才行。女孩的一生都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每年都有 10% 的女孩被折磨致死，剩下的也都生活在痛苦中，工作的能力被严重削弱。很多人都步履蹒跚，甚至用膝盖爬行，女人都走不了远路。

从一开始传教士们就反对裹脚，所谓的“金莲”。逐渐的基督徒父母都让女儿们保持一双“大脚”，自然的脚。外国的妇女们成立了“天足会”，一个大脚妇女的社团。社团筹集资金，印刷宣传册，面见地方官员及总督，并向皇太后提出请求。最后，禁止缠足的法令终于在 1914 年颁布。反缠足社团则发展成了为女孩争取高等教育的组织。缠足是女性遭受压迫的象征。在这种新的精神下，政府希望女孩能够得到和男孩一样的教育。¹¹

牧养教会

事工分两大块，传播福音以及牧养教会。瑞典中国差会的教区有一万平方公里，五百万人口。大部分人从未见过任何的基督教活动。因此到目前为止福音宣讲占了主要地位。现在传教士们意识到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牧养并发展年轻的教会。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教堂的礼拜中也是这样。没有固定的日程，但唱诗、祈祷、读经、讲道是最重要的部分，跟在瑞典一样。经过考察、在领圣餐者面前坦诚信仰、接受洗礼后，信徒就能成为教会的一员。而将信徒逐出教会，要在经过训诫以及开除教籍之后，在圣会会议中进行。做错事的人悔改之后，提出请求，可以再次被接纳。正常情况下每月举行一次圣餐会，由传教士或当地的同工、执事或教会长老主持。为了让信徒们能够庆祝圣餐，在星期天经常会到很多村子里去。祈祷、见证、读经等聚会提供了更多让参与者奉献的空间。“变戏法”表演在清楚的

¹¹ 《秦地》1905 年 7 月 15 日

表现圣经里的外国文化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发展中国教会

只要是传教士自己主持礼拜或者讲道,他可能会发现工作比较容易。但涉及到教会秩序,使用当地同工,以及教会管理的时候,就要困难的多了。这主要是由于瑞典语与汉语语言文字的差异以及各种宗教观点的不同,导致中国的基督教徒不愿意通过个人奉献来帮助教会达到经济上的独立。但是传教士们努力培养他们对于教会、对于领导培训的责任感,让他们慢慢地担起对于学校、小礼拜堂以及教堂开支的责任。

1903 年冬天,北京传教士联合会举行了一次会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代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组织,旨在推进中国传教工作的一致性。会议决定:

- 新编统一的赞美诗集,用文理本(为了清晰明了),以及普通话(为了纯粹庄严)。
- 教堂或者小礼拜堂使用统一名称。英文的 chapel 译作“福音堂”,即传福音的地方;church 译作“礼拜堂”,即做礼拜的地方。委员会还会就新教在中国的名称提出建议。
- 圣经以及其他文献所提到的神和圣灵,分别叫做“上帝”以及“上灵”。传教布道时,传教士可以使用他认为合适的名称。
- 准备建立一个基督教会的联盟。
- 该委员会是负责此类事宜的总委员会。

1907 年,基督教事工已经在中国开展了 100 年了。五百名传教士被选出来作为代表开会进行了庆祝。1922 年的会议,有 535 名中国人以及 478 位传教士参加。当时的争议便是在圣经之外,是否允许使徒信经中的早期教派的信仰存在。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外国的传教组织不应该为中国的教会制定规则。最后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在拜祭祖先的墓碑与基督教的

信仰是无法共存的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一致。新约圣经的新翻译版本要试用三年。

衛潤世的任务

在衛潤世的信中，他提到了有时会持续几个月时间的布道旅途、包括洗礼以及按立执事的信徒大会、葬礼，还有教堂长老的任命。驱逐信徒出教的事情很少发生，但依然让人伤心。他叙述了在一个教徒家中参加的一次不同寻常的葬礼，将近 800 个人参加了这次葬礼，但没有任何的异教活动。葬礼上有三十多道菜，但没有提供酒水。客人们一边吃一边听执事以及福音传道者从死去的人的角度讲述饮酒、抽大烟以及给死者烧纸钱的危害。祈祷，葬礼仪式，以及接下来几天的追思会让客人们感受深刻。与传统背道而驰确实需要勇气。¹²

除了在这个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国家里传播福音这些共同责任，一些传教士还有特殊的任务。衛潤世的特殊任务便是教区建设。不知道他怎么会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他一直想在鸡公山寻找几片合适的区域，来建瑞典语学校以及夏天的住处。他设计了在蒲州和海州的小教堂，购买并运输了所有的建筑材料，而且指导了所有的建筑活。后来他也在猗氏设计了另外一个教堂并做了测量。在庄严的献堂礼仪式上，人们专门向他表示感谢。他也给很多布道所建造了很多建筑。在一次谈话中，后来定居在蒲州的一位老传教士，奚服礼，告诉我，“衛潤世太矮了，所以你都无法从他建造的门洞里站直了走过去。”

祖父衛潤世的第一个家庭

1907 年，衛潤世和挪威传教士特拉·哈特雷姆结婚了。特拉是十年前跟另外两位同样来自于挪威的年轻女士一起来到中国的，然后一直都在瑞典教区工作。她学汉语非常轻松。他们生了个儿子叫古斯塔夫，婚后不到一年半，特拉就死于严重的痢疾。衛潤世感觉他的幸福婚姻就像一场梦，只有小古斯塔夫的存在才能提醒他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记下了妻子的病

¹² 《秦地》1907 年，来自衛潤世的信 1/4

情，传教士朋友们的帮助，和妻子朋友一起参加的圣餐仪式，以及特拉的幸福与感激之情。她很快就要见到耶稣了。在她的最后几天里，她见到了耶稣好几次，“他是如此的美好，他就在这里，耶稣啊抓住我的手吧！给她水喝的时候，她说：“不，谢谢你，亲爱的，我就要去喝生命之水了。”所有的朋友们都被深深地触动了。第二天，100 个中国信徒和 18 个外国人陪伴他们所爱的人来到海州城外的墓地。衛潤世和小古斯塔夫从他们幸福的家搬到了运城，佰信诚一家给了这个孩子一个新家，衛潤世则和佰信诚只身去了北京。¹³

第二年夏天古斯塔夫十个月大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据说是出牙期病症。他“回家了，回到了耶稣和妈妈的身边”。衛潤世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他的心坚信“万能的主引导着一切，期望着给他的子女最好的一切。主啊，原谅我们对您的抱怨和牢骚吧”。¹⁴

拼读改革

事工之友们共同感受到神的感召，他们为传教士祈祷，并提供资金。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他们教区很多地方的名字如何发音，如何拼写。中国的汉字与发音并不相一致，而是与形象有关。每个名字可以有很多种书写方法，但看的人并不懂如何发音。发音的唯一共性是与英文拼写相关联，前提是读者要知道某个音的英文拼写。但并不是所有事工之友都懂得。1907 年，事工组织引入了一种建立在瑞典语发音和拼写的基础上的拼写中国地名的新方法。但是，仍然要求事工之友们在写信的时候，用英文方式拼写地址¹⁵。

河南所有教会都成立了勉励会，这是基督教青年团契的世界性的运动。其任务是“用热忱扩展基督的国度”。大部分信徒对此很有兴趣。这对于信徒个人直接为神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很多人花了不少时间自愿做这些普通教徒的工作，这使得圣会团结，教堂人满，奉

¹³ 《秦地》1908 年，来自衛潤世的信 3/12

¹⁴ 《秦地》1909 年，衛潤世 8 月写的信

¹⁵ 《秦地》1909 年 8 月 15 日

献更多，而且出现了包括祈祷以及读经的家庭崇拜¹⁶。

一名新传教士

1911 年，一个名叫格尔塔德·赫尔道夫的候选人来到了瑞华会。她来自于蒙斯特拉斯，瑞典的卡尔马附近。当时 22 岁的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出生于一个温馨的基督徒教师之家，有一个哥哥，十个弟弟妹妹。她的母亲叫安娜，父亲叫 J.A.V.·皮特森，但孩子们却都姓了赫尔道夫这个姓。十四岁的时候，格尔塔德经历了信仰上的决志。在成为传教士之前的准备阶段，她去了南泰利耶圣经学院学习。1911 年的复活节，她在胡斯克瓦纳事工教堂被授命在中国服侍主。在送别会上，家人、朋友、以及事工之友环绕在她周围，为她祝福。差会的领头人，传教士符愷励和佰信诚都讲了话，格尔塔德宣读了她的告别经文：“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她花了一个夏天在英格兰学习语言课程，于 8 月 26 号踏上前往中国的路，10 月 10 日到达上海。在中国内地会之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她去了扬州的语言学校。

1911 年革命

格尔塔德到达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动荡的年代。满洲帝国倒台，内战爆发。山西和陕西的传教士们为了安全起见离开布道所去了沿海城市，当局派出了十个人的护卫队。他们主要乘坐马车或者骑驴前进，到达河南府附近时遭遇了三十个强盗的攻击，东西被抢，一些传教士受了重伤¹⁷。不过他们依然能够继续前行，最终到达了烟台的中国内地会。在那里，他们在一个街区小教堂里继续传教工作。他们希望当这些考验结束后，中国人更加愿意接受福音。被迫离开教区的那些同工们，这让他们很伤心，同时也为留在教区的同工们担心。他们热切地期待着来信。有一个消息让卫润世很受鼓舞，那就是教会仍像以前那样尽可能的向前发展，

¹⁶ 《中国事工》，1912 年

¹⁷ 《中国事工》，1911 年

执事们到布道所之外的地方参加每月一次的会议。有公开声明表示，布道所，教会以及相关学校都会得到保护。很多人逃进了山里，但解州（原海州）的信徒们却没有，他们毫无畏惧的聚在一起举行礼拜仪式。衛潤世认为布道所以从战争破坏中保存下来，是神创造的奇迹，因为他认为大部分的革命者“来自于一些在中国风行的秘密社团，其中大部分人非常排外。”

传教士们认为 1911 年的革命并不是破坏性的暴力活动，而是精神苏醒的标志。“和以往的战争相比，它是以一种最文明方式进行的。”¹⁸

1912 年 2 月，衛潤世和另外两名男传教士坐船到了上海。其中一人留在那里帮助缓解某些地区的饥荒。另外两位则想办法与教区取得联系，确定当时的形势，判断大家何时能够回去。他们收到了一封电报，是关于北京兵变和抢掠的。他们乘坐一条拥挤不堪的小船来到汉口，然后通过重新开放的铁路到了河南府。衛潤世评论了当时在火车上看到的破败景象，不过也包括中国男人发型的变化。留了几百年的辫子终于没有了，即使老年人也留起了短发。瓜皮帽随着辫子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礼帽。除此之外服装倒没有改变。他们带着一大笔用来工作的钱来到了河南府。终于放心了，在福音传道者的帮助下，他们把钱埋了起来，感受着与人们重聚的欣喜¹⁹。当时几千士兵驻扎在这里。从市长那里了解到，由于士兵的不可靠性，形势依然危急。他们继而赶往了运城，这里的布道所还安然无恙。当地官员派士兵保护他们，他们拒绝了。但当再次启程的时候，他们还是接受了一个护卫队。政府驻军，革命军队，以及强盗帮子已经对住在那里的人们构成了威胁。一些福音传道者成立了红十字会来照顾战争中的死伤人员。他们得到了慷慨的经济援助及小麦等粮食。神学院的房子被用作医院，他们一共收治了 124 名士兵，只有三名没有救过来。他们利用红十字会的基金安葬了 60 名士兵。²⁰

¹⁸ 《中国事工》，1912 年

¹⁹ 《中国事工》，1912 年，选自衛潤世的日记 3 月 19 日

²⁰ 《中国事工》，1912 年，选自衛潤世的日记 3 月 19 日

新的时代开始了。所有邪神寺庙都被清除，有公开声明称神灵崇拜是错误的²¹。儒家学说被认为是旧政权的支撑，现在“他们的书籍以及学说被严格地，甚至是过度严格地从政府学校剔除了”。佛家寺院被废止，不过还俗的尼姑在其他地方得到了保护。

衛潤世一直期待着传教士回来工作的那一天。在 23 名骑兵的护卫下，他回到了河南府，又经过汉口，最后回到上海。是瑞典领事召他回去的。领事也担心着年轻的格尔塔德在语言学校是否安全，跟其他人是否和睦。不久之后，格尔塔德跟在烟台的弟兄姐妹们会合了。外国势力冒着惹来更多憎恨的风险，向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难以接受且具有侮辱性的条件，试图恢复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权利。在烟台，衛潤世收到了一名刘姓福音传道者的一封信，告诉他各种各样的危险依然威胁着整个区域，1600 个土匪的攻击，针对基督教以及布道所的威胁，以及严重旱情所带来的饥荒的威胁，让人们提心吊胆。²²

截止到 1912 年九月，几乎所有传教士都回到了教区以及他们自己的布道所。变化很大。很多人赶来参加聚会，售书人员被派了出去，全员大会再次召开。很多聚会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传教士们第一次觉得穿外国的服装变得自然起来。²³ “人们忍受了外国人，这是事实。但他们并不爱这些外国人，局势会很容易改变，敌意会再次出现。”不过他们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善行。

鸦片收容所的工作不再重要，因为政府严厉打击吸毒。买卖鸦片是违法的，触犯法律可能会让一个人送命。政府颁发了连根拔除的方法。按照登记的抽大烟的烟民，居民每十户分为一组。根据年龄及健康状况，他们必须在一到三个月内戒掉鸦片。触犯者要么被判入狱，要么被处以极重的罚款。种植或买卖鸦片的任何人都会被剥夺土地或其他财产。如果当地官

²¹ 《中国事工》，1912 年

²² 《中国事工》，1912 年

²³ 《中国事工》，1912 年

员没有尽到打击抽鸦片的职责，可能会得到跟罪犯一样严厉的惩罚。²⁴ 吸烟草者增加了，政府同样严厉打击。1911 年，仅有的 8 家鸦片收容所里只有 100 个病人。但鸦片种植并没有永久消失，因为政府还没有完全控制反叛者和土匪。据传教士说，1918 年鸦片种植再次出现在陕西。政府只是征收了种植税，但相对于鸦片贸易所得的收入，那些税费简直微不足道了。²⁵

1913 年是中国动荡的一年。联合政权反对伪满洲帝国，但等到满洲国倒台后，矛盾不断的各个派别却分裂了。1913 年的叛乱几乎将 1911 年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政府与社会党派——国民党的内战全面爆发。动荡的局势影响了未来几年传教士的生活。来自于土匪，革命军，以及正规军的传言或者消息，传教士被捕，被杀，或者受伤，以及敲诈勒索变成了传教士生活的一部分。²⁶

祖父衛潤世的第二个家庭

1913 年 12 月 11 日，一场婚礼在运城举行，衛潤世迎娶了来自于蒙斯特拉斯的格尔塔·德·赫尔道夫，也就是我的祖母。礼拜堂用棕榈叶和小旗子装饰的非常漂亮，教堂里满是人，有来自于山西、河南的传教士朋友们，运城，解州（海州），蒲州以及芮城四地教会的成员们，还有镇上的很多居民，他们也都是传教士的朋友。婚礼以一首瑞典语赞美诗开始，但以一首中文歌结束。对于大部分的客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的婚礼。新娘身穿白纱，一名妇女评论道，“跟天仙一样的衣服”。典礼结束后，人们便来恭贺这对新人，送上结婚礼物，然后便是喝茶、吃晚餐、喝咖啡，其间伴有经文朗诵以及对新人的祝福。²⁷

最后，衛夫妇终于在蒲州布置了他们的新家。一位同事描述道：“地方虽然狭小，但却如

²⁴ 《中国事工》，1913 年 1 月 15 日

²⁵ 《中国事工》，1918 年

²⁶ 《中国事工》，1914 年 2 月 15 日

²⁷ 《中国事工》，1914 年 1 月 15 日

此的温馨，井井有条”。他们为讲道的兄弟们开展圣经课，为镇上的信徒做了一个礼拜的祈祷，为妇女们成立了圣经学习小组，售书，并开办男子学校及女子学校。他们家访，探监，还去医院探望病人。两年后，他们盼望已久的第一个孩子终于出世了。但当天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死了。“托尔来了，又走了”，格尔塔德在她每日祈祷的小册子上写下了这句话。这是她作为传教士候选人的时候收到的一本小册子，每一天都有一句圣经引言。格尔塔德和衛潤世以优美的字迹先后在对应日期里记录了一些重要事件。这些记录涵盖了出生，死亡，以及去和离开中国的旅程，这本小书最后给了我的父亲，来纪念他的母亲。

中国的基督教会

1913年3月，全国各地教会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120个事工代表参加。其中三分之二是外国人，三分之一是中国人。会议旨在建立一个摆脱西方教派藩篱，单一事工的全国性教会。所有教堂必须用中国基督教会的名字。会议建议，中国人可以分担管理国外教会支援的资金的责任，教堂要根据所在地命名，而不是在哪个差会名下。传教士候选人要受过全面的教育，确实拥有学习语言的天分，首先要在自己国家的事工工作上取得了成就。新人要被派出去参加外地的各种活动，来了解中国各地的情况。将会在北京，广东，南京，汉口成立语言学校。²⁸

在九年后的另一场类似会议中，参会的中国人已达到了半数，而准备委员会则全是中国人。那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教会精神生活的发展”，副标题则是“本地教会的建立”以及“本地教会的事工责任”。顾子仁在中国的教堂很有名气，他总结了当时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情况，包括革新的佛教，企图重新恢复影响力的儒家学说，成立新的折中教派的努力，想要替代宗教的新的审美哲学，以及学生中间的新文艺复兴运动等。他认为，让中国的基督教徒担起责任，将福音传遍中国的时代到来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基督教仍然会被认为是外来教派。

²⁸ 《中国事工》，1913年11月1日

“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想要中国的教堂自主，并担起因此而来的责任。”²⁹

夏天的热浪——避暑住处

弟兄姊妹们经常讨论他们需要一个避暑住处。有一个在河南鸡公山上建了一所房子，便邀请几位同事夏天过去同住。但更多的人也需要一个庇护所，躲开夏季的炎热。衛潤世和其他很多人一直寻找了好多年，想找一块合适的地方或房子。1914 年夏，他们终于买下了期待已久的避暑住处。那座山海拔 2000 英尺，从汉口坐火车六个小时就到了。房子和路都已经修建好了，卫生条件也很好。邮局、电报局、警察局夏天都开门上班。游泳池、教堂、新鲜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给大家带来了快乐，让大家得到休息。“传教士们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是差会最重要的资本。这就是为什么夏季休整如此重要的原因了。”³⁰

衛潤世，一个建设者

蒲州的基督徒们一直渴望有一个新的、更大的礼拜堂，他们一直等着筹到足够的资金。教会将会奉献三分之一。1915 年的新年，尽管缺钱，衛潤世已经准备开始教堂的建设。一名姓曹的传道人对于这个等待已久的教堂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谁将达成这一切？在神的旁边，是意味着欢喜和团结的我们，还是我们的从不知疲倦的瑞典朋友？虽然他们不一定会亲眼看到这一天……因为这就像是一笔投到了企业的钱，它将带来很好的回报。”³¹ 几个月之后，他们在布道所的附近买了一块地，这块地皮上原本是一座寺庙，这让谈判变得复杂了许多。建筑材料已经买好了，比估计的省了不少，因为他们从地下挖出了一些旧砖，仍然可以使用。

1916 年 11 月的一个周末举行了献堂礼。乡村城镇的人们成群而来，连附近的街上也都

²⁹ 《秦地》1922 年。20 世纪 30 年代，教会生活越来越政治化，顾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反对基督徒对中国状况的态度。（R. G. 泰德曼著《中国和她的邻居们——世界基督教史》398 页，第 10 章）

³⁰ 《中国事工》，1913 年 8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及 1914 年 11 月 1 日

³¹ 《中国事工》，1916 年 1 月 15 日

挤满了人。警察试图封锁道路，阻止他们。响铃之后，人们聚集到教堂前面的大院子里，一起唱歌，打开大门，以地方官员为首陆续进场，风琴奏出华丽的乐章。每个座位都坐了人，甚至连站的地方都被占满了。衛潤世发表了关于教堂的演讲，姓曹的布道人向所有的捐赠者表示感谢，姊妹教会的人也表达了她们的问候。当地官员、军队、学校，以及各部门都以很高的礼节来祝贺衛潤世。教会送给他一本包装精美的中文圣经，同时教堂也收到了来自于传教士们的同样的一本。献堂礼邀请了所有参与建设的工人。节目接下来的便是男信徒聚会和女教徒聚会，讲座以及唱诗。星期天早上，身穿白衣的六个男人和五个妇女在圣殿的洗礼池完成了受洗仪式，格尔塔德用风琴为他们演奏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赞美诗。星期天的晚上，在装饰得很漂亮的教堂里进行了圣餐仪式，“两只大烛台和四个瑞典台灯透出的光非常明亮”。新受洗的信徒也领了圣餐。第二天人们离开了，留下了对教堂的祝福，希望它就像大门上的匾额所写的那样，变成“所有人祈祷的地方”。

在节日的这两天中，有 400 个人吃住在布道所。在教堂之外还有几个其他的新建筑，在教堂院子的入口处有一个街道礼拜堂，还有和来访者谈话的一个房间；一个两层的房子是男子学校，里面有自己的厨房；一座坚固的新房子是女子学校，还要建一座附属建筑。一旦计划中给女教师的房子建好，“这可能会是所有布道所中用于事工和学校目的的配置最好的了”。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作成为可能，首先要感谢事工之友们的自我牺牲精神，还要感谢建筑材料的顺利购买，“对此我们真诚地感谢主”。³²

叫卖圣经的小书贩

传教士们可以从圣经公会买到便宜的书籍。叫卖圣经的小书贩沿街叫卖书籍，他们并不一定是好的传道者。这个工作对传教士来说太花时间了。圣经的每一节都会有一些简短的介绍，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圣经。有时候，一个读者通过自己阅读，获得了救赎的信息，一

³² 《中国事工》，1917 年 3 月 1 日

群信徒便都会相信这一章节。据说有个教会有四个售书小贩在工作，他们其中的一个每个月卖出 600 本福音书，还不包括宣传册和其他书籍。

在鸦片收容所

通常情况下，要使一些人变成信徒，在独自阅读之外，需要更多的个人接触和影响。接触的机会可以是在布道所，布道所之外就是在鸦片收容所了。根据烟瘾的严重程度，病人要在收容所待上十天到一百天不等。传教士罗伯特·贝尔格林是位药剂师，他做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治疗报告。³³ 他用一定量的吗啡药水代替鸦片，而且逐日减量。他跟病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他的目标就是“决不让病人在治疗期间感觉难受，要让他带着兴趣去跟着我们礼拜，阅读我们的书籍，记住我们所给的经文”。开始时，管理者要确定病人同意遵循这些规则。在虔诚的祈祷氛围中，在管理者和其他信徒的友情帮助下，病人不仅仅脱离了对鸦片的依赖，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教堂会众的一半都曾经是收容所的病人，剩下一半中很多人要么家人也曾在收容所待过，要么参加过收容所的祈祷。收容所能够做到部分自给自足，而且不能有传教士作为管理者。相当一部分鸦片收容所建在农村，而且成为了那些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们的聚会地，一些还发展成了教会。由于抽大烟者在治疗过程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疼痛和痛苦，管理者必须有基本的医疗常识并备有一些药物。很快他就被看作了医生，人们有了各种小病也会来收容所寻求帮助，这也增加了传福音的机会。

一个中国同工

郭大通可能是瑞典事工之友们最为熟悉的一个中国同工的名字。他是神忠诚的奴仆，很多传教士都和他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常被人们叫做“约翰”，是解州的一个执事，帮助处理各类事务。他知道如何用简单易懂的话与人交谈，即使新来的人也能理解他

³³ 《中国事工》，1913 年 12 月 1 日

的意思。他带着纸和笔聆听布道，每次都要给教堂留下点什么，因为他和别人得到了教诲。冬天的时候他在鸦片收容所工作，他独特的治疗方法经常获得成功。他甚至还是“一个高水平的外科医生，很多他给包扎的病人都恢复了健康活力”。由于家庭原因他迁到了临晋，在那里他的平静变成了对教众的幸事，帮他们渡过了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还是被召回了运城，成了一名街区教堂讲道者。1916 年底他被自己骑的骡子踢伤，第二天就去世了。³⁴

河南府的两个教区属于瑞典中国差会和奥古斯塔那会。从 1908 年他们划分了区域，瑞典人在穿城而过的河的西岸，美国人在河东岸。经济兴旺，很多士兵驻扎在当地，铁路职工，政府官员以及很多旅行者都住在这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生命的面包发到大众的手中。”

格尔塔德经常给她亲爱的父母亲及兄弟姐妹写信。一天她给蒙斯特拉斯和兰格纳斯的青年会写了一封信，她也曾经是那里的一员。她告诉他们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感召，以及那些死去的年轻的传教士朋友们。“我们感到奇怪，神把我们亲爱的斯维娅召回了家，但他并没有犯任何的错误……这是为什么？为了让她的位置空出来吗？不是，因为会有更多愿意为神生活和工作的年轻男女们来到这里，补充他的位置。”³⁵

回家

1917 年格尔塔德和卫润世回到了瑞典。卫润世已经在中国待了 15 年，格尔塔德也已经待了 6 年。事工之友们收到强烈的要求：“他们需要休息和调整，用爱和祈祷迎接他们吧！”³⁶他们坐了四天马车来到了河南府，然后坐火车到达天津，经日本铁路北上，经奉天到达东北九省的哈尔滨。在那里卫润世的钱包被抢，车票，护照以及 200 卢布都被抢走了。他们继续踏上了跨西伯利亚铁路，期间换乘了 15 次火车，经历了火车上无法忍受的拥挤，后来为了换

³⁴ 《中国事工》，1917 年 1 月 15 日

³⁵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1916 年 6 月 14 日

³⁶ 《中国事工》，1917 年 6 月 15 日

得护照在圣彼得堡还做了十天工。七个星期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瑞典。他们向中国事工期刊以及其他报纸描述了中国的形势以及事工的现状。他们还谈了对于革命后的俄国的印象，以及中国东北九省与西伯利亚气候和植被上的不同。³⁷

衛潤世依然背负着在蒲州建教堂时遗留下来的债务。全国的旱情使得物价上涨，他不得不给工人们增加工资，之前精细的预算就变得不太现实了。现在他们不得不依赖事工之友们的慷慨解囊了。这是事工收获的时节，他们谈到了意义重大的福音传道工作，以及基督徒们日益深化的精神生活。现在参加星期天礼拜已经成了文明化的标志。但基督徒们知道，成功也许会带来风险。一位传道人说道：“事实证明，相较于应对义和团运动带来的迫害，教会更难通过革命的成功获得发展。”

蒲州市长以及其他权威人士想说服衛潤世传教士这段动荡时期暂时不要回家，但 1917 年 4 月 27 日，他们还是离开了蒲州。政府官员，一队士兵，以及一个乐队出现在送别会上。对于教众和学校孩子们的热情欢送，还有友邻教会送来的送别礼物，格尔塔德和衛潤世非常感动。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希文，也就是我的父亲，在瑞典出生了。他的头两岁都是在瑞典度过的，这对于他后来的健康长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打算回来休息的衛潤世和格尔塔德，不得不承担起了管理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杜夫博儿童院的责任。这个儿童院建于 1911 年，主要是为了照顾那些由于接受教育的需要，或者因政治动荡不能跟父母生活一起在中国生活的传教士的孩子们。房子跟休假传教士之家建在一处，传教士之家在 1900 年中国动乱期间所有传教士回归瑞典时就已经存在了。在瑞典的两年，衛潤世去了不少地方宣传事工，也参加了很多事工聚会。从 1919 年开始，传教士的子女们就不需要为了上学而回到瑞典了。建于鸡公山的瑞典学校让大家很高兴，这是瑞典孩子们在欧洲之外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和孩子

³⁷ 《瑞典早报》，1917 年 6 月 19 日；《内里科斯新闻》，1917 年 6 月 22 日

们不用再被迫分离，一分就是好几年，而是每年都可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相聚在一起，这让他们更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学校作为一个最好的桥梁，将瑞典各个差会的传教士以及事工之友们联在了一起。³⁸

回到中国

1919 年 11 月，在斯德哥尔摩为卫润世、格尔塔德，以及另外两名传教同事召开了送别会。18 号他们就坐火车到了挪威的克里斯蒂安亚，几天后他们乘坐“斯塔万格海湾”号轮船前往纽约。小希文很快就满两岁了。在克里斯蒂安亚，他们得到了亲爱的事工之友的照料，并聚集在一起举行了以中国为主题的聚会。³⁹ 格尔塔德在给家里写的信上描述了这段经历，以及神是如何保护他们的。随后他们坐了六天的火车从纽约经芝加哥以及洛杉矶，到达旧金山。在那里他们登上了“南京”号。格尔塔德描写了他们在船上的生活，包括食物，天气，乘客，她甚至还把他们所住的船舱里面的样子画了下来。她谈到了希文的生日，圣诞庆典，还有他们的祈祷生活，檀香山大片的鲜花，还有横滨码头工人们新年的庆典。7 个星期以后，他们到达了上海。

抵达了运城后，他们要先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是最大的布道所，所以他們要负责所有的聚会、会议和接待来访者。⁴⁰ 格尔塔德作为主妇，计划并购买了“2000 个鸡蛋，还有其他一些东西。鸡蛋是最便宜的”。卫润世成了蒲州和运城两地的牧师。因为往返于两地需要一天半的时间，蒲州的中国人担起了很大一部分责任，格尔塔德认为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⁴¹

他们在海州城 70 公里外的一个村庄的窑洞里度过了夏天。窑洞里面，尤其是窑洞的深处，比普通的房子凉爽的多。窑洞里有不同的房间。家具除了床之外，还有箱子。中国的教

³⁸ 《秦地》1920 年 1 月 1 日

³⁹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1919 年 11 月 19 日

⁴⁰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1920 年 2 月 4 日

⁴¹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1920 年 3 月 21 日

会人员有他们自己的窑洞。传教士们很喜欢这里的凉爽、山间漂亮的景色以及平原、清凉的小溪、私密和与朋友的关系。衛潤世去了海州一趟，他已经开始在那里建教堂了。他们已经为建这个教堂祈祷十年了，开始筹款也有五年了。衛潤世对他手下的工人很满意。小教堂建在镇子中心的一块地上。它能容纳 400 人，漂亮的色彩和内部装饰让它看起来很吸引人。明年夏天小教堂就要竣工了，衛潤世也将把它交给这里的教众。⁴²

新增家庭成员

1920 年的年底，他们搬到了他们热爱的蒲州。11 月 11 日，第三个儿子艾纳出生了。这几个月来希文每晚都要为这个“小妹妹”祈祷，就像如果他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着来自瑞典的包裹，他就会为包裹祈祷一样。1929 年的 12 月，蒲州传出了关于地震的报导，随之而来的是火灾、疾病，以及神的保护之手。布道所定在下一年进行大面积的住房重建。⁴³

山西省省长阎锡山成功地抑制了鸦片，缠足以及邪神崇拜。运城的寺庙都被毁掉或者改成了学校，邪神节日也被禁止。他的小册子“教育人员须知”说明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它还阐述了儿童义务教育以及植树造林的必要性，以及自我考察的需要。所有人都应当崇拜上帝，所有宗教应当被接纳。一些人评论道：“没有哪个基督徒能像这个人一样，可以把洗涤罪恶的需要阐述的如此清晰。”

普世

1919 年祝圣了第一位中国主教，这是英语教会传教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他叫蔡升，于 1889 年被按立为牧师。⁴⁴ 中国的传教工作较早地表现出了差会间合作的特色。尤其是在教育机构方面，两到三家教会共同运营 69 所神学或者医学学校，他们在文学和社会问题上

⁴² 《秦地》1921 年 8 月、11 月

⁴³ 《秦地》1921 年 4 月

⁴⁴ 《秦地》1919 年 6 月 5 日

相互合作。5 家教会共用同一个办公室和员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必然会给中国基督教带来巨大影响，西方宗派主义在其他地方就要影响教会了，在这里却被它抵消了”。⁴⁵ 一些差会已经建立了文学委员会，为符愷励提供的帮助之一就是有一个有水平的中国同工来协助他进行翻译工作。1919 年他完成了圣经史，并翻译了马丁·路德的“基督徒的自由”和奥格斯堡教规。他在语言上的天赋以及对于中国思想的了解是相当难得的，他们希望符愷励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但他还要负责中国以及自己国家的很多其他事情。

自治和自传的进程

整个教区的第一次大会举行了。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有了大会章程，这是教会秩序的草案，⁴⁶ 也是向着自治和自传发展的又一步。章程进一步陈述了很重要的一点，传教士们不能掌握太多的管理权，因为在这个看不到结局的动荡时代，他们极有可能再一次被迫离开教区。军队领导们正在中国北部打仗，运城的官员们在准备战斗以及防御，人们害怕土匪，害怕抢劫。与沿海的铁路联系已经被切断。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一个传教士发现代表们对于教区生活的进步有很大的兴趣，他们体现出了和谐和成熟。“每个人讲话的时候都会说一些联系现实的内容，引发讨论或深思。”⁴⁷

教徒们通常来自于社会下层，很大一部分还曾经是染上鸦片瘾的人。这些都是有困难的人群。我们都知道，大多数成功的传教士不仅有志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还想尽可能的改变他们的经济状态。所以事工变成了现代工业活动的促进因素。传教士们担心教区成员的孩子离开家去做学徒或者帮工的时候会轻易丧失信仰。从 1916 年，合阳布道所开办了一所工业学校，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编织地毯。他们的目标就是，学校通过销售自己的产品，能够不接受国外的资金而实现经济独立。

⁴⁵ 《中国事工》，1918 年 5 月 1 日

⁴⁶ 《秦地》1920 年 8 月 15 日

⁴⁷ 《秦地》1922 年 3 月

新安的儿童院

在河南府附近的新安县，传教士玛利亚·皮特森已经开始照顾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了，人们叫她卞教授。一个男孩加入了教会学校，女孩们则在儿童院里的学校中与走读学生们一起学习。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孩子们的数量一直在增加。1921年，儿童院有200多个孩子，但这也只是救济工作的一部分。姊妹们还增开了收容所，一家收容所有200个男孩，另一家则有600个妇女，还有一个孕妇之家，以及可供1000个人吃饭的社区厨房。1922年，儿童院有了一所专门建造的更宽敞更适合的房子，房子是西式建筑，还有一些中国风格的附属建筑。孩子们有了更宽广的运动场。“新安县的儿童院，是那些被抛弃的女孩们、被送人的男孩们的庇护所，也成了镇上最好的一道风景。”⁴⁸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工作也有所发展。年长的孩子们接受了就业培训，一些孩子学习制作儿童院所需要的鞋子，一些学习纺纱，编织地毯和布袋，还有一些制作家具。女孩们在儿童院里有不同的任务，也接受了培训。年长的女人们给孩子们缝制衣物。

衛潤世多次描写了看望儿童院的情况，其中一次是暑假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出去工作之前，孩子们被允许痛快地玩一个星期。这些孩子们真能玩啊，尽管有好多人身有残疾，但整个院子里都能听到他们欢快的声音，还有吵闹声。

瑞典中国差会与瑞典其他差会的关系

因其联合事工的特点和信仰的原则，瑞典中国差会在瑞典的差会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发表于1921年的一篇文章解释了这两个概念。信仰的原则被理解为一个使命，知道自己接受了神关于进入真正的信仰斗争的感召。信仰祈祷的意思是，当你为某个特定或紧急的事祈祷的时候，你知道你拥有它。信仰不是编造出来你的计划并要求神赐福，而是要进入神

⁴⁸ 《秦地》1923年5月5日

的计划，这样才不会失去神的祝福。不是要让神在我们的活动中跟我们在一起，而是我们在神的活动中跟神在一起。“实际上，一个原则和另一个是有区别的。”**联合事工**应该被理解为建立在信仰和经文基础上的爱的联合，仲裁者、支持者和传教士的联合。“全瑞典的瑞典中国差会之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同源同工的组合，他们将瑞典中国差会塑造成今天的样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友人并不是从任何有组织的瑞典中国差会团体中找来的，他们来自所有的基督徒团体。⁴⁹

1920 年，事工期刊《秦地》发表了关于瑞典派往中国的差会如何从纯粹的传福音的角度看待各种各样的事工活动的调查结果。关于医疗工作，它说，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基督教的不信任，并且这是很多人与基督教联系的自然纽带。医疗工作是基督徒助人之爱的最明显的表现。关于办学工作，它提到了以下几点：1) 没有学校，我们就找不到接受过必要教育的同工；2) 没有很好的学校，事工是没法在中国赢得尊重的；3) 很多时候，非基督徒父母甚至整个家庭都因为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孩子而信主。关于基督徒在传福音方面的个人参与，“我敢肯定的回答说‘有’，几乎没有例外，不管是慕道者还是教区成员。”⁵⁰

1921 年 8 月，在瑞典斯玛兰德省的霍尔斯比·布朗恩圣经中心为休假中的传教士以及传教士候选人举办了一个培训班，这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培训班。培训内容有，查经、关于事工历史及宗教的启发性演讲和讲座、事工方式、语音学等，培训期间也有休息、陪伴和个人反馈等安排。这一年，瑞典的差会有 13 家，共 559 名传道士。

救济工作

官兵以及土匪的烧杀抢掠给中国的北方地区带来了灾难，如此反复下去，教区遭受了饥荒。传教士们经常进行救济工作，瑞典方面所提供的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和同工。

⁴⁹ 《秦地》1921 年 7 月

⁵⁰ 《秦地》1920 年 11 月 15 日

他们也得到了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衛潤世经常成为地方救济委员会的领头人。1921 年，衛潤世接管了大约相当于 5 万克朗的一笔资金，这是中国政府从国外借来，用以在外国人的帮助下分发给那些贫苦的人们的。与村子领导以及可靠的信徒们一起，衛潤世对蒲州和 500 个村庄的 16 万人的需求进行了评估。“当然了，一大批的人已经从饿死的边缘被救出来了，这是得到大家承认的。我们过分苛求的工作中，并没有什么精神剩余。每次聚会时教堂里都挤满了人，这是事实。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饥饿迫使他们来到这里，或者只是想寻求一些东西，来安抚他们那无止尽的饥饿感。”⁵¹ 当委员会知道有的人家决定卖妻卖女来救活其他家人的时候，他们尽量提供一些工作，一张粮食兑换券，或者直接给一些吃的东西。这一年，有一半的地区收获的时候，已经分发了 2 万公斤粮食。

几个地方开了粥棚和施饭中心。在蒲州，格尔塔德在一个寺庙里开设了粥棚。巨大的锅里是很稠的米粥，最大的能装到 16 桶。每天，他们都会用掉 40 公斤的小米以及 12 公斤的白面。格尔塔德监督整个的分粥过程，女信徒们轮流向大家讲述神的故事。即使那些饥饿的人们只是来为他们的身体讨些吃的，基督徒们也希望神能赢得他们当中的一些。“神这个词有它天生的力量，必将结果。”那些穷人们先登记，经过考核后就可以获得一枚徽章，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布施。一种新的救济工作是“为食物而工作”。马车从运城赶到黄河。回来的路上，马车上装的是从一个废弃的寺庙劈出来的石头。这些石头被用来铺路。这一年，有三百个人为了挣一口面包参与铺路。⁵²

衛潤世外出很多，他和格尔塔德没有太多的时间聚在一起。“一次短暂的亲密的对话……你必须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格尔塔德给她的妈妈描绘了这样的瞬间：“小的睡得很沉，我旁边的盘子里放了一杯葡萄汁，一块新做的蛋糕。玫瑰花朵很大、很漂亮，绿叶看起来非

⁵¹ 《秦地》1921 年 10 月

⁵²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 3/4，1921 年

常新鲜。要是你可以过来，就能来分享我们的欢乐了。从在中国的海上，神把我们送给彼此的那一天起，九年的幸福生活一晃就过去了。”⁵³

水凹的静夏

很多的传教士由于救济工作而筋疲力尽。当夏季的热浪再次袭击镇上那些院落狭窄的布道所时，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了。弟兄姊妹们需要一个凉爽的地方休整一下。由于炎热，很多人得了夏季病痢疾。“中国人经常说，在农历第六个月份（公历 7 月），小孩和小动物很容易生病。”在战争不断的年月里，住在山西和陕西的人们走不到也没钱去河南的鸡公山。现在水凹建了一个新的避暑的地方，就叫静夏。简单的中式风格，“感谢我们的父以及我们的朋友”。

⁵⁴ 尽管衛潤世和格尔塔德已经非常累了，而且有两个孩子，格尔塔德还要学习语言以便熟悉学校的教材，但是这个夏天，他们还是要承担起男女主人的角色。后来，他们开始希望在山上建造他们自己的小屋。

在布道所的生活

格尔塔德介绍了在布道所的生活和工作。通常在小教堂里有两场早祷。在聚会前、中、后在会客室里都有活动。识字的妇女帮助那些不识字的学唱赞美诗以及背诵圣经章节。在 1921 年的一次大会上，按立了三名男执事和一名女执事。“我们亲爱的年长的李夫人已经跟随我们很多年了，她几年前决志信主。我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大力支持，她年长、独立，她认为正确的事就会说出来。”格尔塔德和教圣经的妇女在一些村子里的布道帐篷周围很活跃，当人们感兴趣并“数小时聆听耶稣基督的语言以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也很受鼓舞。

在小教堂举行的结业典礼上，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学生因良好表现获奖。学生们自己选出

⁵³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1921 年 5 月 13 日

⁵⁴ 《秦地》 1919 年 3 月 15 日

获胜者，奖品是价值一美元的书。女生们和她们的老师们组建了一个俱乐部，她们把它叫做“赞美上帝会”。一名女生要辍学，因为她要结婚了。她自己是很想继续上学的。“唉！这些婚姻故事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琐事啊。可怜的女孩们，她们的地位也不比日用品高。”衛潤世已经被授命使用政府的资金在当地开展三个大的项目了。他在签订这些计件工作合同前，都会向来自权威部门的代表和订约人介绍这些地方。“你们应该有能力处理任何事。”⁵⁵

教众增加了给学校的经济支持，这是肯定他们工作的一个信号。让信徒奉献来向会众生活自身提供经济支持反而更难。小教堂不够用，他们也分成两派争论。如果他们在城镇里建立大一些的教堂，他们就希望国外教会提供更长时间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农村建立几个小教堂，信徒则有可能能够承担费用。⁵⁶ 因此，重建了新安县的老布道所并扩大为一个小教堂。运城的小教堂也增加了 150 个座位。更多的小教堂要求增加布道人。教众无法供养更多的布道人，所以他们希望有志愿布道者。神职人员对圣经的解释有时候并不完美，但是他们仍然带领教众进行崇拜、祈祷、赞美。也给神职人员的助手和成熟的教徒开办查经班。

亲人丧亡和抚慰

1922 年 6 月，衛潤世和格尔塔德经受了巨大的损失。全家带着两个男孩住在水凹。小艾纳只有 20 个月大，非常可爱，是一个爱笑、阳光的孩子。每个人都喜欢他，叫他“平安娃娃”。他得了痢疾，5 天后出人意外的死了。“现在他得救了，我们大家最亲爱的。他再也不会和其他人一样陷入罪恶中了”，衛潤世这么写道。朋友们和很多中国人都为失去这么一个快乐的孩子伤心。“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像一缕阳光照亮了每个人。现在他仍在照耀着我们，在我们家里，他甚至比以前更明亮。”这年 9 月份，他们的女儿安娜·格雷塔降生了。“很奇怪，但

⁵⁵ 衛潤世在格尔塔德 1921 年 11 月 18 日的信里加进了这些内容

⁵⁶ 《秦地》1923 年 5 月 5 日

也许很自然，我们亲爱的艾纳在我们心里的位置仍然空着，而格雷塔有她自己的位置”，她妈妈如是写道。⁵⁷

1923年1月，全家去了运城两个星期。他们参加了3天的预算会议、5天的大会，与瑞典和中国的大会代表以及事工委员会的会议、关于妇女工作的妇女会议等。尽管天气非常冷，达到了零下十度，整个行程还是非常顺利。通常会议都是很宝贵的时间，这次比其他的则更宝贵，充满了爱和亲情。“围绕神的话语，我们有很多宝贵的瞬间。晚上，我们互相讲述工作和悲喜的话题。这能帮助我们在祈祷中更好的服侍主。”⁵⁸

针对事工期刊的年轻读者，格尔塔德描述了一个瑞典儿童在位于中国的布道所的生活。“小弟弟现在刚刚成为一个好的、有能力的小朋友，他正在家里与天使和耶稣一起玩。小妹妹正躺在她的小床上，她还只会笑。她还帮不上5岁的哥哥，他想要真正的乐趣，挖沙坑、推手推车、建房子。当然他像中国小孩们一样会说汉语，也希望跟他们一起玩，但是他们经常说脏话，也做一些父母不希望他看到或听到的事。”不过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希文有了一个玩伴。那是一个来自黄河岸边荒凉的湿地地区的老奶奶。在家里，她这个婆婆和四个儿媳妇关系不好，因为婆婆花很多钱来吸鸦片烟。她来到蒲州的布道所，希望能够戒掉鸦片。“不管是在沙坑里还是爸爸的棉花地里，在屋里跟小妹妹在一块还是在砖垛上，建房子还是剪纸人，丢沙包还是坐着聊天，滩里王娘对她的小朋友都非常有耐心，手很巧。”可是有一天奶奶被叫回家了，希文又无聊了——直到学生们要练习圣诞歌的时候。希文会唱很多歌。“他们很羡慕他的记忆力和汉语。”他现在所盼望的是，“再过三年，我就要到鸡公山上学了”。⁵⁹

又一次救济工作，又一次丧事

事情并不像希文计划的那样发生。严重的饥荒又发生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更希望

⁵⁷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1922年10月3日

⁵⁸ 来自格尔塔德的信，1923年1月24日

⁵⁹ 秦地》1923年2月20日

节约一些，少做救济工作。但是为众人考虑，我们希望钱早点到。”当地的救济机构又一次给传教士们提供了一些钱用来在蒲州的寺庙里开施粥铺。希文的妈妈这年又到了那里工作。她每天向 300 多一无所有的人们提供食物。这些人经常连一块给孩子遮羞的破布都没有。其他的人则吃棉种、树皮或树根。

2 月的一天，格尔塔德觉得很累，在家里没有出去。她躺了下来，而且昏迷多次。两天后，她死于脑膜炎。衛潤世在一封给他在蒙斯特拉斯的岳父母的信中解释了格尔塔德如何从他身边消逝，弟兄姐妹如何站在她的床边，她如何恢复意识、微笑、给孩子喂奶。她很满足，但还是滑过了生命的边缘。衛潤世抱着小格雷塔坐下来，“小太阳，我们的小珍宝”。她呼吸很急促，脸颊也变得通红。他知道，她也生病了。“神啊，你不能这样，我们不能，一次一个还不够吗？”她好像在凝视着远处，衛潤世想，她可能看见了她的妈妈和哥哥们在向她招手，让她到他们那里去。几小时过去了，神给了他恩典，“看到如果主想要把她也带走，还不如把我们都带走。希文和我不得不接受生活中没有这个阳光的现实。”小的死了，人们把她放下，让她休息，就回去睡觉了。“多么孤单，多么阴沉，多么空虚！”后来衛潤世给格尔塔德的父母写道。这可能是他所写过的最困难的信了。他“心碎成了片，受伤，快要崩溃了”。5 岁的孩子跟父亲说，“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也许他是想安慰父亲，也许只是说出了一个显然的事实，他继续说，“很快我们就能到耶稣、妈咪、哥哥和小妹妹那里去了”。⁶⁰

两封报丧的电报从中国发到在斯德哥尔摩的事工办公室。符愷励给格尔塔德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结尾说，“主用更紧的纽带把我们跟天堂和他联系起来。是的，在神和神的子民所在的天堂，我们会再见面的。我们只是被一层薄薄的纱帐隔开了，他们在等着我们。所有都是恩典。所有都是爱。”⁶¹

⁶⁰ 来自衛潤世的信，1923 年 2 月 23 日

⁶¹ 来自符愷励的信，1923 年 2 月 14 日

追思礼拜和葬礼

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衛潤世讲述了在蒲州的小教堂举行的追思礼拜的情况。整个仪式被爱所充盈。爱是所有演说的主题，有神的爱，也有格尔塔德的爱。男执事、教圣经的妇女、布道人、女执事等，每个人都是格尔塔德表现出的爱的见证。对学生、需要帮助的人、挨饿的人、犯错的人，“她是穷人的妈妈”。她不仅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也为他们而哭泣，“尽管他们并不是她的国民”。她是会众的主心骨，现在却离大家远去了。“她去接受给她的荣耀了。我们呢？我们确定能到那一步吗？”

第二天，人们都聚到小教堂院子里，把两口棺材抬到了驴子背上。“在驴铃和众人的哭声中，我和希文开始孤单的向最终的栖息地走去。很多我们所深爱的人都安息在地下，等待着复活的清晨。”大清早，一列不同寻常的送葬队伍走过长长的商业街。有一百多个人跟着，他们都是每天从格尔塔德手里接受食物的人，有盲人，有瘸腿的，有架拐的，有衣衫褴褛的，有男人也有妇女。很多妇女大襟衣服里裹着没穿衣服的小孩。在灵柩的前面举着几面旗子，一面大一些的是教众用白绸做的，写着“献身治世”。在一家客栈住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早上他们到达了海州。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等在那里了。在挖好的墓穴前面，人们开始唱赞美诗，有人出来讲话。铲上六铲土，代表重聚的希望——也意味着“最后的联系断掉了”。棺材放进一个水泥套棺，然后填土。⁶² 今年年底，衛潤世给希文写信说，他们已经把亲爱的艾纳的棺材、托尔的小小棺材带到了海州，放到了妈咪和小格雷塔的墓中。现在巨大的墓碑也树立起来了。

衛潤世把希文送回了瑞典

如何抚养儿子，是衛潤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把他放到哪里去呢？他觉得自己没

⁶² 来自衛潤世的信，1923年2月23日

有能力一个人抚养他，出差的时候既不能带着，也不能把他留给中国人。他觉得他们不能在蒲州的大房子里住下去了。中国的礼节不允许这么做，因为那里有一个女校，有妇女在那里工作。衛潤世自己都有可能哪天寄宿他处。他还是决定把希文送回瑞典，而且要尽快。再过三个星期，哈恩家就要离开了，他们可以把他带走。他给格尔塔德的父母写信，不过他也知道，他们收到信的时候，希文已经上路了。他希望孩子“会喜欢他的外祖父母……写这些的时候，我的心在哭泣。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给我的孩子祈求一个家。哭也没有用。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⁶³

带着沉重的心情，衛潤世把这些要上路的人送到了上海。刚到的传教士约翰内斯·阿斯普伯格（艾牧师）来到他这里，来抚慰他的孤单和悲伤。——正是约翰内斯，大约三十年后，他女儿转到了我班上——外祖父母很欢迎希文，他们给了他一个新家，其实这里就是他 5 年前降生的地方。

悲伤

衛潤世的时间都被蒲州和北边城镇的救济工作占据了。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给那些以各种方式记住他和他的小儿子的人写信。他通过事工期刊向大家致意，他的“那么多深爱的跟耶稣在一起的人，现在不像当初看起来那么遥远了。隔开我们的无尽的深渊现在消失了，他们离我越来越近了。”财产登记的时候，他给岳父母写信，“我的财产都在天上，既不会生锈，也不会被虫蛀。没有什么能破坏它。在那里，我很富有。只是这感觉有些奇怪！实际上，现在看到我们的大屋空空如也，身边的床空着，我一点都不难过了。但是实在太空虚，太孤单，太奇怪了。”⁶⁴

快到年底的时候，他写信提到现在的动荡局势以及做好进入神的旨意的准备的重要性。

⁶³ 来自衛潤世的信，1923 年 3 月 1 日

⁶⁴ 来自衛潤世的信，1923 年 5 月 2 日

“对我来说，有时候有些黑暗，浓厚的黑暗和对深爱的神的信仰的基础展现在巨大的磨难中。但是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知道我信任谁，尽管我不理解主的方式或者对我的行动。留住我的是，他有着比那些我们能用眼看到、能抓到的更大、更高、更重要的计划让我们遵循。我们到家，看清现在藏在我们身后是什么的时候，那是多么好啊。”⁶⁵

“正是在外围，你才能直接接触到外面的”

事工最重要的任务当然就是传福音。教徒群体有了改变，方法也要改变。“正是在外围，你才能直接接触到外面的。因此，通过在城里和农村的当地教徒，我们才有最好的影响非基督徒的机会。”如果当地的同工能做，传教士就应该从这些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的任务是，成为领导人的领导，脱离直接管理。⁶⁶

据教区报告，1925 年韩城和合阳的教众已经第一次派出了两个传教士。教会长老王洛民和他的妻子被派到宜川去继续那里的事工。这个地方离家 210 公里，路上充满了危险，一派就是三年。“他们走的时候不哭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教会自传的信号，传教士在这里可以作为基督徒教众的仆从。

1923 年，他们试验了一个通用于整个教区的大纲⁶⁷，以便新的信徒了解基本的教会生活情况。在教会委员会秋天在卿头召开的大会上，九个在春天的会上汇报过的“寻求真理的人”被注册成为新信徒。推荐了四个新信徒成为教会成员，他们在解州的秋季会议上将会受洗。在卿头，他们也讨论了在教会一位领袖人物所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建一个盖茅草的小教堂的可能性。这样就能给教众省下来租用目前的聚会场所的租金。这些租金要花去教众每年一半的奉献。他们决定，如果一个地方对福音有明显的兴趣，传道帐篷在那里就应该至少停留两个星期。一个小一些的地方报告了一个妇女的故事。这个人 20 年来每次聚会、唱诗、祈祷

⁶⁵ 《秦地》1923 年，来自衡潤世的信 5/7

⁶⁶ 《秦地》1923 年 5 月 5 日

⁶⁷ 《秦地》1923 年 5 月 5 日

都参加，简直就是一个女牧师，因为周围地区没有哪个男信徒能够见证主。⁶⁸

饥荒和洪水

1923 年底，衛潤世对救济工作进行了总结。在收获季节，他们向 22300 人发放了价值 2 万 5 千克朗的 120 吨粮食。对衛潤世来说，这也意味着他在春天进行了大量大范围的走访以及仔细的评估需求。从 8 月开始，他又领导了在永合的一个不同的救济工作。这里大雨导致了山洪爆发，冲垮了 48 个村庄。黄河水不断上涨，终于有一天早上把整个镇子淹没了。幸亏是在早上，人们有时间逃命，但是所有的家产都没了。当局责令衛潤世进行救济工作，根据仔细评估，他向 400 多人提供了帮助。作为对这天的记忆，他收到了一个用画框装裱起来的大幅照片，照片上他坐在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还有一个大的乐队。衛潤世本人对这么多人来聆听福音感到高兴，“据我们所知，有些人是信了主的”。⁶⁹

1923 年，中国基督教全国差会举行了第一次年度会议。三分之二的代表是中国人。那几天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深化中国基督徒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政治动荡和事工条件

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很自然的会引起中国人对他们的敌意。中国人希望能够废除这种特权。“无怪乎中国人这么想。外国人租界内有法庭、警察，享有特权，就像这个国家是他们的似的。没有特别许可，中国人不能住在外国租界，他们受外国警察管辖，也不能抓那里的政治避难者。这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吗？！”政治动荡阻碍了事工活动。⁷⁰

在一些省份学校联盟的声明中，传教士被称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and 外国资本家。学校成了中国不断蒙羞受辱的罪魁祸首。如果消灭了这些传教机构，外国帝国主义也就被消灭了。

⁶⁸ 《秦地》1924 年 3 月 5 日

⁶⁹ 《秦地》1924 年 2 月 20 日，对比：注 97

⁷⁰ 《秦地》1925 年 9 月 5 日

瑞典中国差会教区的学校暂时还没有受到外部攻击或者内部示威的威胁。⁷¹ 政府想让教会学校注册,这样在教会学校就读的 50 多万中国孩子就能接受跟政府办的学校一样的教育了。但注册意味着教学不能有宗教内容,而教宗教内容正是教会学校不注册的主要原因。山西的学生会进行的反基督教运动宣称,“基督教是统治阶级压迫贫困人民的工具,是帝国主义用来攻击弱国的武器。”他们也宣传“消灭反动的世界中国传道会”的重要性。世界中国传道会在很多学校里与学生会是并存的。⁷²

一个妇女想信主。她了解到真理之路的时候,已经素食很多年了。她许愿遵守佛教的戒律,绝不吃肉,也很虔诚的参加仪式、烧香拜佛。她以为自己脱离了罪恶,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平安。有一些人打破他们的誓约,“开口”与传教士一起吃肉,“但也会害怕后果”。也可以通过吃葱来打破誓约,葱被认为和肉一样是亵渎神灵的。这样就能脱离佛教。⁷³ 这时出现了新宗教运动。其中一种是“同善社”。同善社是一个宗教团体,它平等对待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同善社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每天向基督、穆罕默德、佛祖和孔子进香。⁷⁴

衛潤世去瑞典把希文接回中国

1925 年,衛潤世 22 年来第二次回瑞典。当他还在回去的路上时,像母亲一样照顾希文的岳母去世了。希文这时已经 7 岁了。⁷⁵ 衛潤世拜访了在卡姆拉的亲戚,又在蒙斯特拉斯跟希文和格尔塔德的家人待了一段时间。和其他休假的传教士一样,他在国内为了事工四处奔走。一年后,他要返回中国了。希文跟着他一起,他要到鸡公山的瑞典学校读书。现在他们离的近了,放假的时候希文可以回家了。

⁷¹ 《秦地》1926 年 5 月 5 日

⁷² 《秦地》1927 年 3 月 5 日

⁷³ 《秦地》1923 年 8 月 6 日

⁷⁴ 《秦地》1924 年 8 月 5 日

⁷⁵ 《秦地》1925 年 3 月 20 日

衛潤世在布满了鲜花的蒙斯特拉斯道别，希文在这里度过了几年快乐的时光；衛潤世在从卡尔玛到卡尔斯克罗玛的火车上道别，火车经过一片漂亮的山顶空地；衛潤世在旅行中的不同站点与亲戚朋友们道别。乘船回中国的行程很顺利，只是热浪袭人，甲板上阴凉处也有 47 度。希文得了腮腺炎，被送进了船上的医院。衛潤世坐在床边，非常担心，不过希文很快就痊愈了，那个机警又有趣的旅伴又回来了。衛潤世说。40 天后，他们到达了上海，然后去鸡公山。希文马上就要 9 岁了，要在那里上学。10 月，衛潤世在一个给美国、瑞典学校的员工举办的聚会上庆祝了自己的 50 岁生日，希文也“被允许跟大人们一块”。⁷⁶

衛潤世接过了蒲州的主管位置。他现在是这里唯一的外国人了，这是他很久以来一直担心的。这是他和他的家人幸福生活过的地方。“主确切的告诉我，事情会比我想象的要好。”蒲州教会的接待人员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⁷⁷ 同事休假的时候，他还要负责 300 公里外的河南府的教众。他在很多信中描述了渡黄河的艰难。他登上一艘超载的船，船开了，慢慢的水变浅了，他就得下船。要么涉水，要么让人背着走上几公里，坐另一艘船走一段路，再让人背着向上游或下游走几公里，最后才算渡过去。有时候在炎炎夏日，热的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在数九寒冬，河面都冻上了。

持续动荡

1926 年底，蒲州的人做好了打仗的准备。2000 多人在蒲州城外挖了一道战壕，还修了一条把加农炮推上城墙顶的路。陕西的传教士要离开这个纷乱的省份。让衛潤世高兴的是，他们在去沿海安全地区的路上，在蒲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岁末年初的时候，衛潤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整理杂物、报告和账单上。全国的动荡还在继续。1927 年 3 月，瑞典学校的师生搬到了上海，过了一段时间又去了日本长崎。各国的使领馆建议传教人员离开中国内地到

⁷⁶ 《秦地》1926 年 10 月 5 日

⁷⁷ 《秦地》1927 年，来自衛潤世的信 5/2

沿海去。最终，所有瑞典中国差会的传教士到了天津，又从那里坐 8 小时的火车去了海边的度假胜地北戴河。他们被分成 6 组，“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这年夏天共有 82 名来自瑞典、丹麦和挪威的传教士以及 5 个小孩在那里。每个星期一的下午四点半到六点，他们聚在一起参加斯堪的纳维亚礼拜。稍后，瑞典学校的孩子们也通过一些渠道跟父母团聚了。

整个夏天，希文和衛潤世都在一起，在天津或北戴河。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他们分别后就再也没能见面。希文和一个同学由一个传教士带着去了瑞典。他们先是坐火车经过奉天、长春、哈尔滨到了满洲里，在那里穿过边境到了西伯利亚。然后继续乘火车穿过苏联到了赫尔辛基，再乘船到达斯德哥尔摩。希文坐船到了欧斯卡沙门，外祖父在那里迎接他。⁷⁸

第三个阶段

现在在中国内地没有什么外国人留下了，也没法预计下面会怎么样。1900 年和 1911 年的经历提醒各国政府努力把他们的国民放到安全的地方。传教士们觉得很难，背井离乡，又不知道工作何时结束。不过他们也把这看作是“经过化装的祝福”。现在那些基督教会没有外国领导者的保护和建议了。他们进入了事工工作的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创阶段，可以追溯到义和团起义的时候。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们和政府都抵制、不信任基督教。不过还是建立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经受了 1900 年的考验而且坚持了下来。“第二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平静、成功、善行”，工作进展很快。在这个阶段，工作越来越多的移交到中国人手中。民族主义加速了发展。如果有一天传教士们回到教区，工作可能要以另一种方式组织了。还会需要他们，但更多的是作为传福音者和顾问了。⁷⁹

⁷⁸ 《秦地》1927 年 9 月 5 日

⁷⁹ 《秦地》1927 年 8 月 5 日

返回教区

1927 年 9 月，衛潤世和三个同事作为先头部队去了山西。在北京的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从山西当局拿到了通行证。到了石家庄他们才发现，铁路在前一天就被切断了。在向当地驻军的统领求情后，他们第二天晚上上了一辆军用火车的行李车厢。到了运城，他们发现那里还算平静有秩序。陕西和河南的局势就混乱多了。

在一份来自新安的报告里提到，人们在儿童院前面挖了两个地窖，打仗的时候有 400 多人躲在里面，有时一躲就是好几天。儿童院已经在炮轰中严重受损了。⁸⁰ 和其他布道所一样，这个地方也被士兵占据了。经常有 100 多士兵加上小孩和参谋人员住在那里。感谢神的恩典，军火库没有爆炸，没有伤亡，甚至没有一例恶性传染病发生。暂时还没有办法向儿童院提供事工经费。不过镇里的领导给他们搜集钱和粮食，传教士们赊购物品，最终市长把从打扑克的人那里罚来的 500 元给了他们。食物、衣服和燃料的短缺在整个地区都在加重。谁也没有办法，“因为要做什么救济工作，都意味着有了更多可作战争之用的钱和日用品，而人们仍然得不到什么”。

“一切正常”

衛潤世回到了他在蒲州的老家。一切都那么美好、干净、有序。工作在进展。一切正常。

“不过发现一切正常的同时，一种压抑的感觉在内心深处升起。”经过这些年的共和，全国饱受战乱、饥饿、贫穷之苦的时候，这个地方仍然很平静。河南府教区现在归衛潤世管了，经历了巨大的苦难之后，这里的 90 个信徒刚刚受洗。传教士西耶听说这里的情况后说，“对人们来说，停下来思考最重要的事意味着压力和苦难。对我们，神的子民来说，保持清醒要经

⁸⁰ 《秦地》1927 年 2 月 20 日

受考验和危险……希望我们所一直祈求的复兴的代价不要太高！当然一个安慰是，在大多数的传教点，尽管没有传教士，工作仍然照常进行。当地的同工们在巨大的危险中勇敢地留下了。山西的传教点也没有因政治目的被充公。有很多我们要感恩的地方。⁸¹

衛潤世希望所有的传教士都能从沿海回来，这样就能有多几个人去探访传教点、向当地同工提供建议，也不用把时间都花在财务工作上了。他发现这不太容易。现在对外国人的态度，已经比先头部队半年前刚回到教区的时候好多了。弟兄姐妹们应该能回来了！从高层获悉，中国政府已经多次承诺传教士及其财产和教会财产都会得到保护。1928 年秋天，所有人最终都回到他们的点上了。⁸²

给爸爸所深爱的希文的信

在给远在蒙斯特拉斯的希文的信里，衛潤世告诉希文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怎样一直期待儿子给他写信，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团聚。他希望希文能记住他在中国的生活、中国朋友和其他的传教士。在信中，他详细介绍他进行救济工作的旅途、访问站点和去村子的长长的路途。他叙述战争和伏兵的情况。他也说他的孤单。好几年了，他一直是蒲州传教点的唯一的外国人。他常常要求儿子为他的孤单的爸爸祈祷。

在希文生日那天，衛潤世会邀请所有的学生来参加生日聚会，讲圣经故事、唱赞美诗、祈祷、喝茶吃饼干。他解释说，他们是在给一个在瑞典的男孩庆祝。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自己的生日。这么多年来，他都是一个人跟中国人一起庆祝圣诞节。内弟从瑞典寄来漂亮的蜡烛，他拿来装饰教堂。他最好的朋友是拉丁，烤小圆面包、做中西餐也有时候跟着衛潤世一起旅行的厨师。有时候，衛潤世希望蒲州变为一个“姊妹点”，这样几个女传教士住在这里，而他自己就可以搬到传教士多的地方去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有人来访问他，他

⁸¹ 《秦地》1928 年 2 月 5 日

⁸² 《秦地》1928 年 9 月 5 日

也到其他点去访问，都是为了工作。当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来庆祝重要的日子，互相送小礼物，尤其是在避暑地的时候。

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来，衛潤世希望希文长成一个刻苦、有能力的学生，最好是全班最好的；一个感恩、能随时帮忙的外孙；一个好小伙子，“毫不专横，且最重要的，成为一个神和世人都喜欢的男孩……你看，像你这样走过这么多地方，看过这么多东西，只要你品质好，不骄傲，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他问及在学校的成绩、读经、游泳考试，以及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他注意到，希文上了钢琴课，去看了牙医矫正两颗长歪了的牙齿。他想参与规划希文的教育。他想知道希文多高了，他在暑假里做什么。他一直在给他的集邮册提供邮票。有时候衛潤世让希文给他寄东西，比如打字机用的橡皮，带胶的橡胶鞋底和家里做的太妃糖——他分给点上的弟兄姐妹吃。他需要吊带裤、给格尔塔德的照片做画框的材料、铁钳。他让希文给他寄照片，他也往家寄他自己冲洗的照片。他用急件给希文寄去几罐枣子、柿子、石榴以及吃的方法。还有一块不走时了的表，用来鼓励希文的“工程天赋”。一箱子书，有些是希文小时候的，有些是他妈妈的，给他作为纪念。“保存好你的小妈妈的第一个护照”——一本由卡尔玛县政府 1911 年签发的对开四页文件。一床鸭绒被，“你的小妈妈的”。希文在瑞典学校的时间太短，衛潤世没来得及送过去，现在寄回家了。他说，希文自己的树上石榴熟了很多，而且“你小妈妈的天竺葵开花了，有红的有白的，很漂亮”。他也告诉希文他和拉丁一起买了鸭子，在传教点上有活的动物真好。

信件充满了柔和的爱的话语和严肃的警告。他希望他们保持联系而不会像一些经历了分别的父母子女那样越来越遥远。“……希望我们两个一直思念彼此……永远不忘定期通信互相鼓励”，“我亲爱的希文，要是我们能在一起多好啊！不过这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了。”

干旱和饥荒年复一年。人们还记得 1876 年，中国这个地方的 70% 的人都饿死了。衛潤

世收到了救济粮。他们的老朋友厨师拉丁在给希文的一封信里写道，“神还没有给我们雨。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意思。不过对那些爱神的人来说，事情最终是好的，尽管我们不理解。”

衛潤世对于他和助手的良好合作很高兴，“神祝福他们，保证救赎他们，保证他们快乐。是的，一些人获得了重生。他们主动前来忏悔他们的罪恶和不义行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只有神主导了心灵，这才会发生。”衛潤世把他的同工派到猗氏去跟一个来自挪威的女传教士进行了 7 天的长谈。“他们回到家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夏天的时候，他去了北京，现在叫北平了，向国际委员会负责救济的人呼吁，并且得到承诺给他 400 吨粮食用于在山西南部免费发放。离开北京，他有机会去了北戴河休息一段时间。他在那里游泳，也会见了一些朋友。当他路过天津的时候，很想去那家俄罗斯小面包店看看。希文返回瑞典前的那几天，他们经常在晚上去吃冰淇淋。

这些信件提供了大量关于车辆和交通的信息。1924 年就已经有了公路和铁路，从运城到上海，30 年前需要 3 个月，现在 3 天就到了。从运城到蒲州 75 公里，衛潤世和另一对传教士夫妇（宋益谦）一起坐三轮车 2 个多小时就到了。要是乘马车，骑马或骑驴子的话，则需要一天半。坐人力车也要舒服一些，但是“一个人拉着车在大热天跑 85 公里太远了，从现在开始，我还是用一天半吧”。刚刚有公共汽车的时候是每两天一班，走相同的距离，他只用两个半小时。从 1929 年开始，他有时候坐小汽车，1 小时 40 分钟就到了。

又一次丧事

衛潤世继续在蒲州和周边地区做救济工作。1930 年 4 月，他的工作被打断了，传教士罗伯特·柏格林去世了。衛潤世立刻赶到了合阳并在那里拥挤的教堂里主持了追思礼拜。他的开场白是，“我们到这里，不是来赞扬死去的人，而是来赞美主。”因为对于到布道所一个月内就死了的人，“异教徒会说，运气实在太不好了”。所以他选择了圣经中神决定每个人年日的

章节。“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和“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⁸³

衛潤世返回了山西的家，不过接着他必须再一次赶回陕西去向另一位同事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主持了追思礼拜，给两位朋友的财产登记造册。渡黄河困难且危险。他感冒了。6月初的时候，他几次尝试坐车去“看医生，因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身体虚弱的症状，可能是高血压”，但都没有成功。病情变成了斑疹伤寒。他去了运城，在这里，他能得到两个朋友约翰内斯(艾牧师)和奥尔加·斯太尔列斯(宋师母)的照顾。他们在一个接受过西医培训的刘医生手下工作。⁸⁴

衛潤世去世

衛潤世自己也成了这个国家巨大不幸的受害者之一，战争和饥荒让他在救济工作中染上了传染病。6月25日，他去世了，被埋葬在海州传教士墓地。他的新坟就在他亲自给两位妻子和四个孩子挖的坟墓旁边。

一名同事说出了他对衛潤世的评价：“他是一名长着清澈的蓝眼睛、有力的大手的传教士，我们的朋友，永远都那么友好、乐于助人。他心肠很好，虔诚，能够自我牺牲。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⁸⁵

追思仪式

四年后，1934年6月，朋友们聚在海州的墓地。安守道姊妹给17岁的希文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这个仪式的过程并寄了几张照片过去。全体人员走到墓地。朋友们围站在坟边，为墓碑揭幕。和其他的墓碑外形完全一样，衛潤世的墓碑高三米多，由一块巨石刻成。上部刻着四个大字：“醒见上帝”，往下是衛潤世的瑞典文和中文名字。现在这里有并排的三个墓碑，格

⁸³ 《秦地》1930年6月10日

⁸⁴ 《秦地》1931年5月10日

⁸⁵ 《秦地》1930年10月10日

尔塔德的，带着托尔、艾纳与安娜·格雷塔；特拉的，带着古斯塔夫；还有衛潤世自己的。

每个墓碑前面用鹅卵石圈出一块方形的墓地区域。

来自蒲州的王执事主持了祈祷。来自洛阳（河南府）的李长老读了圣经的章节，并跟大家分享了他在跟衛潤世牧师共事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洛阳没有传教士的时候，衛潤世也是这里的牧师。来自神学院的学生们献诗。蒲州的谢长老非常动容地谈起衛潤世牧师对神的国度的无穷的热爱和感情，以及他对穷人的慈悲心怀。伽医生提到年轻的传教士衛潤世曾经给过他的家庭的帮助。传教士朋友们裴立德夫妇、宋益谦、胡林德都谈到了衛潤世所经历的苦难、恩典和损失。李长老建议，在场的人应该向希文送去问候。然后大家步行回去了。⁸⁶

“我们没有一个人為自己而活”

几乎所有衛潤世和格尔塔德所写的信都引用圣经作为开头，而且他们经常随后进行点评。1929 年夏天，一封给希文的信这么开头：“我们没有一个人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為自己而死。罗马书 14:7。这点，我亲爱的希文，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没有一个人為自己而活。我们要永远记着，时间短暂。趁着还有时间，我们要努力对那些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联系上的人好。”⁸⁷

这就是我祖父生活的方式。

⁸⁶ 1934 年来自因格伯格·阿克泽尔的信和照片

⁸⁷ 来自衛潤世的信，1929 年 6 月 25 日